

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

(增订本)

曾贻芬 崔文印 / 著



创立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
The Commercial Press

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

(增订本)

曾贻芬 崔文印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

2010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:增订本/曾贻芬,崔文印
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0
ISBN 978-7-100-06265-7

I. 中… II. ①曾…②崔…III. 古文献学-图书史-研究-中国 IV. G25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5790 号

ZHONGGUO LISHI WENXIANXUESHI SHUYAO

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

(增订本)

曾贻芬 崔文印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06265-7

2010年3月第1版

开本 880 × 1230 1/32

201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19%

定价: 40.00 元

题 记

我对这本论文集十分熟悉。作者曾贻芬,是我“文革”之后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之一;而另一作者崔文印,则是我在中华书局参加点校“廿四史”时收认的私淑弟子。他们二位不仅在确定选题时与我进行了商讨,而且在遇到问题时,也都是与我商量解决的。同时,他们的每篇文章,亦都是由我审阅之后,在《史学史研究》上发表的。

他们二位都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,对历史文献学孜孜以求,既不趋时,也不逐利,十年如一日,扎扎实实进行深入研究。他们的每篇文章,都是在阅读大量的原始资料以后写成的,文字平实,每篇都力求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或新意,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。

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是我的夙愿,他们二位的工作,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我的一些设想。现在,文章已粗具规模,我十分高兴他们能结集出版。希望他们继续努力,把这门学科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。

白寿彝

1999年4月于北京

目 录

绪论——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道路简说·····	1
一 简策时代历史文献学的特征·····	1
二 纸张普及后的历史文献学·····	7
三 雕版印刷与历史文献学的发展·····	10
四 古籍的亡佚与辨伪、辑佚·····	13
五 电子出版物的出现与历史文献学面临的新课题·····	15
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·····	18
一 孔子的“述而不作”——关于六经的整理·····	18
二 战国诸子论历史文献·····	29
三 《春秋》三传和历史文献的解释·····	34
两汉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初步形成·····	42
一 两汉时期对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·····	42
二 刘向、刘歆父子的校书与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初步形成·····	48
三 班固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·····	60
四 文献学家——郑玄·····	68
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·····	80
一 文献分类著录的变化·····	80
二 《七志》和《七录》·····	88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·····	97
一 类书的起源及特点·····	97

二 魏晋南北朝重要的类书·····	100
三 附论类书的作用·····	103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总集·····	106
一 总集的发展·····	106
二 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——《文选》·····	109
三 佛教总集——《弘明集》·····	115
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释形式的发展·····	119
一 何晏《论语集解》·····	119
二 范宁《春秋穀梁传集解》·····	120
三 杜预《春秋左传集解》·····	121
四 裴駰《史记集解》·····	122
五 《论语集解义疏》的出现·····	129
六 《洛阳伽蓝记》的子注·····	133
七 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·····	135
八 刘孝标《世说新语》注·····	141
九 郦道元《水经注》·····	144
十 附论颜之推与文献校勘·····	147
隋唐时期四部分类法的确立·····	152
一 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撰述·····	152
二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确定·····	154
三 《隋志》的序和注·····	155
四 《隋志》的纰漏·····	158
五 《群书四部录》·····	160
六 《古今书录》·····	162
隋唐时期的类书·····	165
一 《北堂书钞》·····	166

二 《艺文类聚》	170
三 《初学记》	175
唐人注释书名著三种	180
一 孔颖达等著《五经正义》	180
二 李善《文选注》	184
三 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	190
唐人注释古籍的新拓展——说《匡谬正俗》	197
五代时期在历史文献学上的重要成就	205
一 冯道与监本文献	205
二 毋昭裔与蜀本文献	210
三 附说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	212
宋代的文献收集与官方藏书目	216
一 《崇文总目》与北宋前期的藏书	216
二 《秘书总目》与北宋后期的藏书	221
三 《中兴馆阁书目》与南宋的藏书	224
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	229
一 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	229
二 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	237
三 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	240
高氏诸“略”与章氏《山堂考索》	246
一 高似孙的诸“略”	246
二 章如愚的《山堂考索》	253
三 余论	258
宋代的总集	260
一 唐代诗文最多的总集——《文苑英华》	260
二 姚铉与《唐文粹》	263

三 吕祖谦与《宋文鉴》	265
宋代的类书及其他资料汇编	269
一 官修类书	269
二 私人所修类书	276
三 专题资料汇编	282
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	289
一 刘攽《东汉刊误》	290
二 吴缜的《新唐书纠谬》和《新五代史纂误》	294
三 宋代最完善的校勘文献——廖莹中《九经总例》	300
四 《四书集注》在校勘上的得失	303
五 彭叔夏《文苑英华辨证》	305
六 方崧卿《韩集举正》与朱熹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	309
七 《仪礼识误》及张淳的校勘特点	311
北宋对古代文献注释的变革	316
一 刘敞《七经小传》及其出现的意义	316
二 王安石《三经义》等及其影响	320
三 余论	327
郑樵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	329
一 《艺文略》与《校讎略》	329
二 《图谱略》与《金石略》	339
朱熹的注释和辨伪	344
一 《四书章句集注》	344
二 《诗集传》	350
三 辨伪	353
宋代的金石学	359
一 《集古录》《金石录》与《金石略》	360

二 《考古图》《博古图》及其他	367
三 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》《啸堂集古录》	371
四 《绍兴内府古器评》及《东观余论》	372
五 《隶释》与《隶续》	375
略谈辽、金时代的历史文献	378
一 《辽藏》与《龙龕手镜》	378
二 金代对历代文献的考辨与研究	381
元代历史文献学的概貌与特点	390
一 元代典籍的收藏与刊刻	390
二 趋于浅白的文献注释	393
三 元代的类书	400
胡三省《资治通鉴音注》	403
一 成书始末及其校勘的特殊性	403
二 胡注的内容及其特点	406
三 胡氏的《通鉴释文辨误》	413
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散论	418
一 马《考》的取材	418
二 分类及著录方法	419
三 马《考》的影响及其不足	426
元代文献学拾零	433
一 吴师道《战国策校注》所体现的校勘原则	433
二 苏天爵对当代文献的收辑与整理	439
三 文献著录的变革——钟继先《录鬼簿》及佚名之 《续编》	442
略谈明代的官私书目	447
一 《文渊阁书目》与《内阁藏书目》	447

二 焦竑的《国史经籍志》	450
三 《古今书刻》等专题书目	452
四 《百川书志》《世善堂藏书目录》及其他	455
五 余论	459
《永乐大典》概说	462
一 一部空前的大类书	462
二 《永乐大典》的编撰	466
三 《永乐大典》的流传及其价值	470
明代官修“大全”散论	477
一 《五经大全》	478
二 《四书大全》	486
三 《性理大全》	489
胡应麟与古籍辨伪	493
一 胡应麟之前的辨伪成就	493
二 《四部正讹》对辨伪的新贡献	496
三 胡氏辨伪八法	503
明代丛书的繁荣	507
一 丛书的界定及其特点	507
二 明代丛书的繁荣	509
三 丛书编纂的历史意义	520
略谈顾炎武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贡献	522
一 信守“阙疑”，反对妄改的校书主张	522
二 通古音、求古意，维护古籍之真	525
三 重实践，搜讨金石文字	531
《经义考》初探	537
一 著录及分类特点	537

二 考辨的依据及特点·····	545
三 与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的比较·····	547
全祖望的史学与“七校”、“三笺”·····	551
一 续补《宋元学案》·····	551
二 七校《水经注》·····	555
三 三笺《困学纪闻》·····	559
试论卢文弨、顾广圻的校勘异同及其特点·····	566
一 卢文弨的文献校勘成果·····	566
二 顾广圻的文献校勘贡献·····	572
钱大昕的历史文献学·····	583
一 与史学研究的关系·····	584
二 钱大昕的“考异”·····	588
三 钱氏的《补元史艺文志》·····	593
说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及其编者·····	599
一 其书结构·····	599
二 其书编者为陈梦雷·····	607
三 其书版本·····	612
参考书目·····	615
后记·····	620
再版增订后记·····	622

绪 论

——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道路简说

历史文献学,简言之,就是对历史文献本身进行具体地收集、考校、讲读、运用、著录和各类专题研究的一门学科。这门学科的发展,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。从实际情况看,纸的普遍使用和雕版印刷的盛行,是对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两件大事,本绪论即以这两件大事为契机,阐述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道路。

一 简策时代历史文献学的特征

在纸张作为书写用具普遍使用之前,我国历史文献的主要载体是竹帛。竹即竹简或木牍,帛即丝帛,由于丝帛价格昂贵,普遍使用的是竹简和木牍,而尤以竹简更为普遍。从出土的实物看,通常用的竹简大都在23厘米左右,相当于汉代1尺的长度^①,宽则1厘米左右,而厚则在0.2厘米至0.3厘米之间。每枚竹简通常可写二三十个字,也有写五六十个字的。如果我们以每枚竹简写五十个字计算,一篇五千字的文章就需要一百枚竹简,而像今天一本五万字的小册子,在古代就需要一千枚竹简。不言而喻,像司马迁《史记》这样的百余万言的史著,就需要两万多枚竹简,其体积之大,重量靡轻,都是可以想见的。可以说,由于文字载体的关系,那时的书籍不仅体积大,而且较为笨重,则是普

通的现象。这一情况,就直接导致了当时书籍的流行方式——单篇流传。

翻开记载当时情况的史籍,我们很容易看到当时书籍单篇流行的实例。如《史记》卷六二《管晏列传》:

太史公曰:“吾读管氏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……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,欲观其行事,故次其传。”

诚如唐司马贞所说,司马迁这里所述,“皆管氏所著书篇名也”^②。这些篇什,现在均保留在《管子》一书之中。司马迁不说读《管子》,而列叙篇名,正可反映当时书籍以单篇流传的事实。

再如《史记》卷六三《老子韩非列传》:

人或传其书(按:指韩非之书)至秦,秦王见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之书,曰:“嗟乎!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,死不恨矣。”李斯曰:“此韩非之所著书也。”

同样,《孤愤》《五蠹》都是现存《韩非子》一书之中的篇名,如果当时的书籍不是单篇流传,秦王就不会单单只看到这两篇文章,李斯也不会说:“此韩非之所著书也。”从李斯的话我们已不难体味出,韩非这两篇文章,当时就是单独流行的两本书。

关于这个问题,下面的实例更能使人看得清楚。据《后汉书》卷二三《窦融传》载,窦融作为皇室外戚后裔,经营河西甚有成效。

帝深嘉美之,乃赐融以外属图及《太史公》《五宗》、《外戚世家》、《魏其侯列传》……

这里的《太史公》就是《太史公书》,即《史记》,《五宗世家》在该书卷五九。唐章怀太子李贤说:“景帝子十三人为王,而母五人,同母者为一宗,故曰五宗。言景帝以窦氏所生,而致子孙众多也。”^③《外戚世家》在该书卷四九。而《魏其侯列传》,即《魏其武安侯列传》,在该书卷一〇七。李贤说:“窦婴,太后从兄子也,封魏其侯。魏其,县,属琅邪郡。”^④

堂堂大汉皇帝向皇亲国戚赠书,不是整部的《史记》,而只是其中的三篇,足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确是以单篇流传的事实。

单篇流传的结果是,一部著述很难见其全豹,如儒家著名的经典《尚书》,济南伏生所传今文《尚书》为二十九篇,而鲁共王坏孔宅壁所得古文《尚书》却是四十五篇,比伏生所传多出了十六篇。据王充《论衡》记载:“孝宣皇帝之时,河内女子发老屋,得逸《易》《礼》《尚书》各一篇。”^⑤这种情况,正是书籍单篇流传所造成的。它对当时的历史文献学提出了特殊的要求,那就是:无论你对某一家的文献作任何研究或著录,你都必须把流传在社会上的有关这一家的文献收集齐全,而这一工作就必然要求比勘篇章,删去重复,这就是说,那时的编书和校书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。汉成帝河平三年(前26年),刘向曾奉命负责校理中秘藏书,每一书校理完毕,都由刘向写一个书录,把校理该书的大略情况,连同该书一齐上奏。由于这些书录对了解当时的图书很有参考价值,于是“又别集众录,谓之《别录》,即今之《别录》是也”^⑥。《别录》又称《七略别录》,它是刘向随书上奏的那些书录的别钞单行本。这部书虽已大部亡佚,但仍有部分书录保存了下来,从这些书录中,我们不难看出刘向校理图书的大致情况。如《管子书录》:

护左都水使者、光禄大夫臣向言:所校讎中《管子》书三百八十九篇,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,臣富参书四十一篇,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,太史书九十六篇,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,以校除重复四百八十四篇,定著八十六篇,杀青而书,可缮写也……^⑦

在有些书录中,刘向也提到了校勘之事。如《晏子书录》就指出:“中书以‘夭’为‘芳’,‘又’为‘备’,‘先’为‘牛’,‘章’为‘长’”等。《列子书录》则指出“以‘尽’为‘进’,以‘贤’为‘形’”,《战国策书录》“以‘赵’为‘肖’,以‘齐’为‘立’”等等^⑧,都是在校勘文字时所发现的典型错误。同时,有的书名称混乱,需要统一。如《战国策》,刘向说:

中书本号,或曰《国策》,或曰《国事》,或曰《短长》,或曰《事语》,或曰《长书》,或曰《修书》。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,为之策谋,宜为《战国策》……

这就是说,在刘向定名之前,这部书竟有六个不同的书名,其混乱是可想而知的。而理顺这些文献的头绪,清除这些混乱,正是当时历史文献学的任务之一。

同时,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,竹简是用上下两道或上中下三道编绳编连在一起的,称作“册”,而这编绳则称作“韦编”。过去,一般都说“韦编”是指熟牛皮绳,但从出土的实物看,迄今未见有熟牛皮的编绳,普遍使用的编绳大都是麻绳或丝绳。可见这个“韦编”的“韦”,不过是“纬”字的省写罢了。简册翻阅久了,编绳很容易磨断,例如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……读《易》,韦编三绝”^⑧。这就是说,孔子所读《易》的编绳磨断了三次。“韦编”断绝容易给文献带来两种弊病,一是脱简,二是错简。例如汉成帝时,刘向校理儒家经典之一的《尚书》,他“以中古文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,《酒诰》脱简一,《召诰》脱简二。率简二十五字者,脱亦二十五字,简二十二字者,脱亦二十二字。文字异者七百有余,脱字数十”^⑨。很清楚,所谓“脱简”,就是由于书册的编绳断绝,使有的竹简脱离了原书,因而导致原书出现了阙文,而这种阙文的字数,是和原竹简所写字数相一致的,即刘向所说“率简二十五字者,脱亦二十五字,简二十二字者,脱亦二十二字”。然则,简既已脱去,何以知道这一脱失的竹简写有若干字数呢?诚如清代学者阎若璩所分析:

盖伏生写此二篇,《酒诰》率以若干字为一简,《召诰》以若干字为一简,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。向据中古文校外书,此之所有,知彼之所脱。窃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,则二十五字乃《酒诰》之简,二十二字乃《召诰》之简。《酒诰》脱简一,则中古文多二十五字;《召诰》脱简二,则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。^⑩

又说：

窃意古人受经于师，经有若干篇，篇有若干简，简有若干字，终身守之不敢违，及转写以授其弟子，亦不敢略有所增损。盖损其字数，则简数必溢；增其字数，则简数必亏，非所以敬师傅、壹睹记也。^⑫

至于所谓“错简”，是简册的编绳断绝之后，竹简虽没有脱离丢失，但却排乱了前后次序，导致原书文意的晦涩或不通。这种情况，在古书中常常可以碰到。例如 1973 年底至 1974 年初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的帛书《老子》甲乙本，就与通行的《老子》有许多不同，且不说帛书《老子》甲乙二本都是《德经》在前而《道经》在后，只从甲本的分章看，就与通行本至少有三处不同：①通行本第二十四章，帛书甲乙二本都在二十二章之前；②通行本第四十一章，帛书甲乙二本都在第四十章之前；③通行本第八十章、第八十一章，帛书甲乙二本都在第六十七章之前。以差别①为例，通行本《老子》第二十四章云：

企者不立，	（踮着脚跟的人不能站立，）
跨者不行，	（跳跃的人不会走路，）
自见者不明，	（自逞己见的人不是高明，）
自是者不彰，	（自以为是的人不能彰显，）
自伐者无功，	（自我夸耀的人没有功劳，）
自矜者不长。	（自我矜持的人不会久长。）
其在道也，	（从道的方面来看，）
曰：余食赘形。	（可以说上述行为都是剩饭赘瘤。）
物或恶之，	（令人厌恶，）
故有道者不处。	（所以有道的人不这样做。）

而第二十二章则云：

曲则全，	（委曲则能保全，）
------	-----------

枉则直，	(枉曲则能伸直，)
洼则盈，	(低洼则能充盈，)
敝则新，	(破旧则能生新，)
少则得，	(少取则能多得，)
多则惑。	(贪多则受迷惑。)
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	(所以圣人坚守一个原则为天下的模式。)
不自见故明，	(不自逞己见所以高明，)
不自是故彰，	(不自以为是所以彰显，)
不自伐故有功，	(不自我夸耀所以有功，)
不自矜故长。	(不自我矜持所以久长。)
夫唯不争，	(正因为不与人争，)
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	(所以天下没有人与他争。)
古之所谓“曲则全”者，	(古人所谓“曲则全”的人，)
岂虚言哉！	(难道是空话吗！)
诚全而归之。	(它实实在在可以达到。)

两相比较，特别是从“自见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”四句，与“不自见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长”四句的逻辑关系上看，显然帛书本的章次顺序更令人信服，而通行本这部分的章次顺序，亦显然是在早期流传中，因错简而造成了章次混乱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错简一般不会只错一两个字，它所错的字数，至少是以每枚竹简所写字数为基数的，或是一简，或是相关的多简，如上述《老子》的错简，即属于后者。

以上都是在纸张作为书写工具被普遍使用之前，历史文献学所碰到和所要解决的问题，它因书籍的单篇流传，而形成的编书、校书混为一体的做法，构成了这一时期历史文献学的突出特点。